



西北师范大学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资助项目

主编 田澍
副主编 李清凌
李宝通

中国古代史论萃

——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史论萃/田澍主编.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26—03018—7

I. 中… II. 田… III. 中国—古代史—文集

IV. 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641 号

责任编辑:李树军

封面设计:陈 珂

中国古代史论萃

田 澈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 插页 6 字数 449 千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6—03018—7 定价:48.00 元

《中国古代史论萃》编委会

主编 田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主编 李清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宝通（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三北（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刘建丽（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德芳（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西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小鹏（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赵向群（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赵汝清（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师大兼职教授）

前 言

田 澜

历史学是西北师范大学设置最早的学科之一。

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发轫于 1902 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师范大学西迁西安，与同时迁来的国立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共同组成西安临时大学。次年，为躲避日寇的轰炸，西安临时大学南迁陕西城固，改称西北联合大学，原北平师范大学整体改组为西北联大下设的师范学院。1939 年 8 月，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战局的不断恶化，1941 年起，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陆续迁往兰州黄河北岸的安宁区十里店。抗战结束后，西北师范学院部分教师及学生返回北平，恢复北平师范大学，发展为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其余人员继续留在兰州，发展为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1958 年以前，西北师范学院为教育部直属院校，1958 年划归甘肃省管理，改称甘肃师范大学。1981 年复名为西北师范学院。1988 年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为甘肃省重点大学。

1949 年 10 月前西北师大历史学与地理学合称史地系，之后独立设置历史系。1959—1961 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曾一度并入本系。1970—1977 年，历史系与政教系合并为政史系。1977 年底，政史系又析为政治系和历史系。2000 年 9 月，历史系与中文系、秘书学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敦煌学研究所、西北文化研究所共同组成文学院，原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独立设置为旅游学院，原历史系文物陈列室改建为西北师大博物馆历史文物展室。2001 年，原历史系下设的西

北史研究室改组为西北史研究所。甘肃省历史学会一直挂靠在西北师大历史系。

20世纪40年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陆懋德、杨向奎、徐炳昶、丁易、何乐夫、张舜徽、王树民等先生曾先后在本系任教或讲学。⁵⁰年代以来，金宝祥、金少英、许重远、萨师炯、刘熊祥、王俊杰、李庆善、陈守忠、郭厚安、吴廷桢、赵吉惠、马英昌、张培德、宋仲福、徐世华、龚泽铣、丁焕章、潘策、赵茨、侯丕勋等专家学者先后在本系任教。其中金宝祥先生对西北师大历史学科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宝祥先生于1914年2月6日出生于浙江萧山临浦镇戴家桥。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单位。1950年9月调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至今，为西北师大终身教授。1976—1986年间为历史系主任，曾长期担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86年获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授予“人民教师”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百年的办学历程中，西北师大历史系薪火相传，形成了严谨朴实、勤奋刻苦、自强不息的优良学风，学科建设不断发展，学术水平日益提高。现有专门史博士点，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历史地理学、世界史、历史教育学等硕士点，并招收历史学科的教育硕士，举办高校教师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进修班和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班，办学层次较为齐全。

在西北师大历史学各二级学科当中，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起步早，研究力量较强，学术积淀深厚。1981年，由金宝祥先生牵头申报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获得通过，成为全国首批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之一。在金先生等人的带领下，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得了长足发展。该专业先后招收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西北史、文化史等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硕士生水平较高，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如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魏明孔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王希恩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李华瑞博士(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漆永祥博士(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以及本学科的田澍博士、胡小鹏博士、李宝通博士等人都是在西北师大获得历史学学士和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的。因在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成绩突出,1991年西北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被甘肃省教委授予“教书育人先进集体”称号。1994年中国古代史被确定为甘肃省重点学科。

在长期的学科发展过程中,西北师大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形成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1. 将理论研究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是金宝祥先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西方哲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有机结合。金先生善于将某一历史问题置于历史演进的动态过程中加以考察,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把握最根本的关系,从而探索历史本质运动规律,并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对重新解读这一时期的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金先生在这一方面的研究集中反映在他的《唐史论文集》及其主编的《隋史新探》之中,其治史风格深深地影响着本专业的每位教师和研究生。

2. 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将中国古代史与西北区域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古代史的内容,促进了西北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如金宝祥先生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王俊杰先生对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宋史专家陈守忠先生对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明清史专家郭厚安先生对西北史特别是甘肃史的研究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一学风的影响下,现在的中国古代史专业老中青教师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更加突出的成绩。如赵向群教授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民族问题的同时,对这一时期的西北区域史研究用力尤勤,所著《五凉史探》有较大的学术影响。李清凌教授在研究宋史的同时,还专注于西北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北经济史》是一部研究西北社会经济发展史的主要著作。刘建丽教授在宋史研究中将活动在西北地区的党项、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与西北

地区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助于拓宽宋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宋史的内涵。《宋代西北吐蕃研究》是其代表作。王三北教授在研究隋唐史的同时,对隋唐时期西北边疆政策等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他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古代卷)多次获奖,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李宝通教授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西北屯田研究用功尤著,其专著《唐代屯田研究》在学术界有较大反响。胡小鹏教授在研究宋元时期手工业的同时,对这一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史特别是元代蒙古诸王与世侯的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代表著作《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田澍教授在研究明代内阁制度、大礼仪、嘉靖革新、明清历史嬗变等重大问题的同时,将明代西北历史置于明朝历史的大背景下对其相关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和专门的研究,弥补了一些薄弱环节,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3. 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在教学科研中,强调全面准确地占有史料是治史的第一要务,历史研究者必须夯实文献功底。经李庆善先生整理、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金少英先生的《汉书食货志集释》和《大金吊伐录校补》,郭厚安教授编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明实录经济史料选编》,刘建丽教授等人文主编的《宋代吐蕃史料集》,王锷研究员编著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王晶波副研究员点校的《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等都是这一方面的重要成果。目前正在举行的有郝润华研究员的《李梦阳全集校注》、郝润华研究员等人参加的《续通鉴纪事本末》点校整理、王晶波副研究员点校的《胡缵宗集》等。这些充分显示了本学科教师重视史料的治学特色。

4. 重视将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和考古材料紧密结合,以解决历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如李并成研究员先后实地考察了分布在河西地区和内蒙古西部的古绿洲沙漠化区域、历史上的河湖水系的变迁,调查研究了西北地区的多处古城址、遗址等,其专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本学科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紧密合作,联合主办《简牍学研究》,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西北出土简牍材料紧密结合起来,对我

国古代的文书制度、军事制度、地方官制、赋役制度、邮驿制度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西北师大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德芳研究员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何双全研究员的《双玉兰堂文集》，以及他们参与完成的《中国简牍集成》(1—12册)等成果在学术界有良好的声誉。

作为西北师大的资深教授，金宝祥先生对本校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献出了所有的心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扎根西部，呕心沥血，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甘为人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教学和科研骨干，桃李满天下，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甘坐冷板凳，潜心学术，恪守学术规范，营造了甘于清贫、追求卓越的良好学风，是我们学习的楷模。2004年是金宝祥先生诞辰90周年，我们特别编辑了这本论文集，以此来表达对金先生的敬仰之情。

收入本论文集的作者皆为在岗人员，以西北师大文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教师为主，兼收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等专业教师以及部分西北师大文学院兼职教授的史学研究成果，同时收录了几位在西北师大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的校友论文。每人只限一篇，入选论文皆为作者自定，代表着每位入选者在史学研究方面较高的学术水平。此外，选录了已故青年学者、曾在西北师大中国古代史专业获硕士学位的沈颂金博士所撰写的《历史研究与理性思维——金宝祥教授访谈录》，以便于人们更好地认知金宝祥先生的治学思想。

为了编好本论文集，我们成立了专门的编委会，由我总其成。在编辑过程中，大家积极配合，及时提供作者简介和所选论文等材料，并认真校对文字，确保了出版质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明孔研究员在百忙之中撰写了《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一文，吴廷桢教授、侯丕勋教授、刘建丽教授、魏明孔研究员、王希恩研究员、杨鹏飞副教授、王晶波副研究员、陈志芬老师等人提供了诸多珍贵的照片，这些都为本书增色不少。同时，西北师大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赵逵教授，西北师大科技处有关负责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支持；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李树军同志予以多方指导，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李清凌教授、李宝通教授、胡小鹏教授、李并成研究员、郝润华研究员、伏俊琏研究员、王锷研究员等人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诸多帮助。以上同志的赞襄，使该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谨致谢忱。

在金宝祥先生九十诞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唐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发来了贺信，对他们长期以来关心、关注并支持西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发展，表示真诚的谢意。

恭祝金宝祥先生健康长寿！

西北师大田家炳教育书院

2004年3月18日

目 录

| | |
|---------------------|--------------|
| 前言 | 田澍(1) |
| 庄蹻事迹与屈原晚期的经历 | 赵達夫(1) |
| 谈先秦时期的“诵” | 伏俊琏(52) |
| 三代史官传统与古史传述方式 | 韩高年(62) |
| 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 | 张德芳(74) |
| 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辨 | 郝树声(88) |
| 敦煌悬泉壁书《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考述 | 何双全(114) |
| 早期东部鲜卑觅踪 | 王希恩(140) |
| 西晋课田法新议 | 赵向群(150) |
| 北魏太和十二年李彪屯田史实略考 | 李宝通(163) |
| 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 | |
| ——对《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写卷的研究 | 李并成(174) |
| 唐代佛道之争 | |
| ——论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整合 | 王三北 赵宏勃(189) |
| 唐代科场作弊及防范措施述论 | 魏明孔(205) |

| | |
|------------------------|--------------------|
| 745—840年间唐朝与回纥交往之弊及其实质 | 赵汝清 周保明(222) |
| 唐代依养外亲的孀妇幼孤家庭考察 | 李润强(235) |
| 瓜沙曹氏节度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 | 马德(263) |
| 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 | 王万盈(276) |
| 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床”的探讨 | 黄兆宏(292) |
| 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 | 张邦炜(306) |
| 中国佛教在宋夏金时期的走势 | 李清凌(323) |
| 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 | 刘建丽(337) |
| 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 | 李华瑞(346) |
| 窝阔台汗己丑年汉军万户萧札刺考辨 | |
| ——兼论金元之际的汉地七万户 | 胡小鹏(372) |
| 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述论 | |
| ——兼与方志远先生商榷 | 田澍(388) |
| 清初山左遗民诗群的分布态势与创作特征 | 张兵(414) |
|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匈奴传》漏校、误校举例 | 王锷(432) |
| 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 | 王晶波(438) |
| 柳芳《唐历》考述 | 郝润华(450) |
| 从《全宋诗》的编纂看《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 漆永祥(464) |
| 邢澍著述考辨 | 漆子扬(503) |
| 金宝祥教授九十华诞贺信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515) |
| 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 | 魏明孔(517) |
| 历史研究与理性思维 | |
| ——金宝祥教授访谈录 | 沈颂金(526) |

庄蹠事迹与屈原晚期的经历

赵達夫

赵達夫，男，汉族，1942年12月生，甘肃西和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评议组成员，甘肃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省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对先秦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屈原与他的时代》、《古典文献论丛》等专著，在《文史》、《文献》、《中国社会科学》、《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1992年起任中文系主任，1996年创建了西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2000年任文学院院长，2003年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古典文献学和专门史两个博士点及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先后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甘肃省优秀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

一 屈原研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庄蹠暴郢和庄蹠入滇是楚国历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也都正在屈原生活的时代范围之内。但至今学术界对有关庄蹠一些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研究楚辞者也鲜有涉及。据比屈原稍迟、大半生在楚国度过的荀况所说，庄蹠暴郢发生在楚怀王末年齐楚垂沙之战以后。

此时屈原无论在朝、在野，都应与闻其事。屈原于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之汉北，而三十年又在朝（曾谏止怀王入秦），这期间正好发生垂沙之战与庄蹠暴郢之事，则屈原的被召回朝同这两件事有无关系？屈原被放于江南之野，以后曾两次沿沅水南行，先后至溆浦和沅水上游之地，这个路线同庄蹠入滇的路线正好一致，二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相关问题，也都值得作深入研究。

本文首先依据先秦时代可靠的文字记载，对庄蹠暴郢、庄蹠入滇的有关史实加以探讨。然后将它们同屈原的活动、屈原的作品联系起来，解决一些历来争论不休或未能解决的问题。希望能彻底弄清庄蹠暴郢、庄蹠入滇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有关问题，使我们对屈原生平中的一段重要历史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并解决《怀沙》等作品诠释中的一些疑难。

二 关于史料的甄别与运用

对于庄蹠暴郢和庄蹠入滇之事，早期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就存在一些分歧，今人的看法分歧更大，无论是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是人物的身份，事件的性质，都各言其是，难得统一。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认为应该先由比较可靠的材料入手，肯定一些可以肯定的史实，在此基础上，再对文献记载有分歧的问题加以客观的、细致的分析，弄清关系，甄别真伪，广泛联系当时的历史，力求结论的可靠。

为此，我们先对借以立论的有关文献加以界定、说明。

先秦文献中记载了庄蹠暴郢事件的，有以下几种书：

1.《荀子·议兵》。荀况大约在齐宣王十年（前310年）左右初至齐^①，其时正是楚怀王十九年前后。此后齐楚两国之间反复离合，事情颇多，荀况不可能一点不知道。荀况至楚国大体在齐湣王十五六年，当楚顷襄王十三四年（前286、285年）^②，以后一直在楚，直至去世。则《荀子》一书对庄蹠之事的反映，应绝对可靠。

与此相关的文献有《商君书·弱民》后的一段文字。按说商鞅生活在荀况之前，但这里将《商君书》摆在《荀子》之后，因为《商君书》中

提到庄蹠这段文字，在《弱民》篇末，与《荀子·议兵》中一段基本相同。且这段文字与全篇内容不属，窜简之迹显然。蒋礼鸿先生《商君书锥指叙》云：

《弱民》篇末所言楚事，与上文语意全不衔接，是乃《商君书》简策有脱，后人妄以《荀子》之简补之，岂造是书者之妄成文哉？

蒋先生指出这段文字来自《荀子》，很正确。不过不一定是由于简策有脱而后人以《荀子》之简补之。汉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汉书·艺文志》），武帝时又敕丞相“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如山积”（《文选》卷三十八引《七略》）。“至成帝时，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汉书·艺文志》）。则简策散乱而以意缀合者，有是有不是，非有意为伪。《商君书·弱民》之末所附一小段，很可能即如此形成。此段文字虽为《荀子》中窜入，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仍有其认识上之价值：一则说明《荀子·议兵》中关于庄蹠的这段文字确为先秦时所有；二则，两处文字基本相同，证明《荀子》中关于庄蹠文字之记载并无差错。

2.《韩非子·喻老》。据梁启雄《韩子浅解·前言》，《喻老》为韩非作品，没有多大问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

（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赏之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

由《史记》叙述的情形看，韩非著《孤愤》、《五蠹》、《说难》、《内外储》、《说林》是在已参与政治活动，对诸国情况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之

后。那么《解老》、《喻老》这些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体悟，思想上接近于《老子》道家的作品，应作于师事荀卿之前。据《史记·韩世家》：韩安王五年（前234），“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六国年表》、《秦始皇本纪》所载，韩非使秦时间较此迟一年）。韩非入秦之前在韩国亦应有数年政治活动的时间。《秦始皇本纪》言，秦王政十年（前237），秦王使李斯攻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①。则韩非此时已在韩国从事政治活动。则《喻老篇》之作，应在前237年之前。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所言，韩非之寿在四十、五十之间，则生于前280年前后，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后，所闻庄蹠之事，应亦可靠。

3.《吕氏春秋·介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秦王政初立，年少。因战国之末齐、魏、赵、楚四公子多养食客，而诸侯亦“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仿效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成《吕氏春秋》。则此书之成在秦王政初年。据《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九年车裂嫪毐，十年吕不韦免去相国，以罪迁蜀。则《吕氏春秋》之书成在秦王政九年（前238）以前。且有关篇章皆门客“著所闻”，应有所根据。由《银雀山出土汉简》看，《吕氏春秋》中往往将战国时现成文章等抄编其中（如其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和《爱类》，学者们认为是农家著作）。那么，《吕氏春秋》中关于庄蹠暴郢等的记载应属可信。

下面论述中对汉以后有关资料和一些不同说法的鉴别、去取，悉以《荀子》（并参《商君书·弱民》附文）、《韩非子》、《吕氏春秋》三书为断，其他只作为旁证或参考。与此三书之记载合者或可以互补者取之，与此三书之记载矛盾者皆不作为主要的立论依据。

三 垂沙之战与匡章

《荀子·议兵》记荀况对李斯说：

楚人蛟革犀兕以为甲，鞅如金石，宛矩铁鎛，惨如蜂虿，轻利剽速，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蹠起，楚

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兵利甲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君书·弱民》篇末附文云：

楚国之民，齐疾而均，速若飘风，宛钜铁迤，利若蜂虿；
胁蛟犀兕，坚若金石。江汉以为池，汝、颍以为限，隐以邓
林，缘以方城。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唐蔑死于垂沙，庄
蹻发于内，楚分为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众也，甲兵财用
非不多也。战不胜，守不固，此无法之所生也。

关于庄蹻暴郢的时间与背景，上两段文字一言楚人“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一言“唐蔑死于垂沙，庄蹻发于内”，意思相同，都明确地指出，“庄蹻暴郢”之事发生在垂沙之战以后。

但是，关于垂沙之战，史书中的记载有很多不清楚或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先要弄清垂沙之战的有关问题，以彻底廓清在庄蹻问题上的迷雾。

《史记·楚世家》载：

(怀王)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

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今本误作“昧”，今据梁玉绳、段玉裁之说正之)，取我重丘而去。

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

《荀子》中说的垂沙之战，即指杀楚将唐昧、取楚重丘而去的齐楚之战。由上面材料可以看出垂沙之战的起因和后果。

《战国策·楚策三·(苏子)谓楚王章》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数。”即言垂沙之战楚军所死人数之多。又《楚策四》：“长沙之难，太子横为质于齐。”由《楚世家》记载可知，楚太子质于齐在垂沙之战之后，《楚策四》所言“长沙之难”乃“垂沙之难”之误。长沙，其地在长江以南，当时楚与齐、秦及三晋作战皆不及至此。

《史记·礼书》基本上照录上引《荀子·议兵》中那段文字，而“垂

沙”作“垂涉”，《史记集解》引许注：“垂涉，地名。”《荀子》杨倞注：“垂沙，地名，未详所在。《汉·地理志》沛郡有垂乡，岂垂沙乎？”谢墉《荀子》校（出卢文弨手）云：“垂沙，《史记》作垂涉”。无断语，徒以自乱。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垂字古读若陀（说见《唐韵正》），‘垂沙’盖地名之叠韵者。《韩诗外传》及《淮南子·兵略》并作‘兵殆于垂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数’。则作‘垂沙’者是。”“垂涉”之名，实乃“沙”、“涉”两字形近而误。

垂沙其地，杨倞疑在沛郡（今安徽省淮北市）一带，显然与齐、楚交战情形不合。察其势，应在楚方城以南的沘水边上（当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一册《战国：楚越》图）。

《荀子》言楚唐昧死于垂沙之战，而《楚世家》中作“唐昧”。梁玉绳《人表考》卷七“楚[相]唐蔑”下云：“又作唐昧（昧、蔑古通，各本讹昧）。”则当时为楚令尹^④。

关于这次战争的具体情况，《战国策》、《吕氏春秋》和《史记·六国年表》、《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和《乐毅列传》中都有所反映。《六国年表》楚怀王二十八年：“秦、韩、魏、齐败我将军唐昧于重丘。”在同年相应的几栏中——

秦昭王六年：“蜀反，司马错诛蜀守煇，定蜀。日蚀，昼晦。伐楚。”

齐国一栏云：“与秦击楚，使公子将，大有功。”^⑤

韩国一栏：襄王十一年：“秦取我穰。与秦击楚。”

魏国一栏：哀（襄）王十八年：“与秦击楚。”

《韩世家》：襄王十一年（前301）“秦伐我，取穰。与秦伐楚，败楚将唐昧。”韩国在秦取其地之后即与秦联合攻楚的可能性不大。看来是：楚太子杀秦之大夫亡归后秦发兵攻楚，韩、魏、齐恨楚国不讲信义、弃纵亲秦而乘机攻楚。《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八（“六”之误）年：

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⑥